

## 芦沟桥抗战对日本北进苏联战略的牵制

龚和平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和热、察、内蒙等省的部分地区后,又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挑起了事变。事变发生之后,日本政府不但没有立即派遣大军参战,反而作出了事件“不扩大”的处理方针。7月11日,日本政府突然改变态度,决定向我华北地区大举增兵。弄清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方针及其变化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对于正确认识芦沟桥抗战的历史作用,不是没有裨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林的“后起之秀”,在扩张领土和掠夺资源方面比起老牌帝国主义更加贪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然而,这一发展很快引起国内资源短缺、市场狭窄和原始积累不足等严重障碍的出现。为了突破这些障碍,明治天皇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急起直追,参加新的殖民地掠夺。在这一时期,“它先后在某些时刻几乎同所有其它帝国主义列强都进行过战争,”<sup>①</sup>同朝鲜、中国也进行过战争,这些战争大多数以它的胜利而结束。日本通过战争对邻国的领土侵占和经济勒索,使其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实施“大陆政策”的步骤激剧加快。

实施“大陆政策”必须强占满蒙地区,这是明治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一贯的基本战略目标。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维持和扩大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成为关系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战略的重要问题。同时,日本还企图把满蒙作为“防止赤化的第一线”<sup>②</sup>。所以,日本历届内阁的决策方针,俄国一直是假想敌国,而满蒙则是对俄军事战略上的前进基地。

因此,从1918年底至1925年初,日本乘俄国国内战争仍在进行之际,伙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围攻。它同苏俄打打谈谈,折腾了6年半以上的时间,耗费了7亿日元以上的国帑,付出了大量人员的伤亡<sup>③</sup>,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进攻苏俄的企图。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立即向天皇裕仁呈交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主张对满蒙地区采用“铁血主义”予以占领,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及欧洲”。原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很清楚,要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在元气未恢复的短时期内,重演对俄直接作战的故技是行不通的,必须改变手段和方法。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希望并且斡旋对

中国国民革命存有野心的蒋介石能和它的御用工具奉系军阀张作霖妥协，融成一体，造成“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实现大同团结”，一起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此政治手段来控制中国，达到先期征服满蒙，建立对俄作战前进基地的目的。然而，在全国人民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蒋介石从多方权衡，没有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一则因军事失利，二则也不敢完全满足日本关于在东北地区开矿、设厂、移民等苛刻要求，因此也没有表示绝对服从。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于是阴谋策划和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激化了同奉军的矛盾。“继承张作霖的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合为一体，正在使满洲从属于中央。这样，过去那种想通过培植亲日政权使满洲成为特殊地区的满蒙政策，就完成不中用了。”④

此举受挫后，日本陆军从1929年起又开始制定用武力侵占满蒙地区的作战计划，仍然想用战争来达到既定的战略目的。正值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也被卷入危机之中。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此，加深了它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加强了与苏联接壤的朝鲜、满洲的抗日民族运动，也加强了日本国内的革命运动”⑤。这样，日本统治集团的危机感就更加剧了。面对这一形势，日本陆海军军部力排内阁中主张“缓和政策”的意见，坚决要求以武力来保住“帝国的地位和势力”。“特别是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少壮派认为，如不重视满洲的形势，把它尽快地变成日本的完全的殖民地，并进一步以此为据点，去进攻他们视为赤化策源地的苏联，就不能解救日本的危机”⑥。同时，他们还乐观地认为：对满洲行使武力可以一举成功。因为“当时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地区的能力”⑦。基于这种估计，日本军部和政府进行了各种准备。在经济上，日本军部向政府提出增拨军费的要求。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虽然十分紧张，但鉴于扩军备战的需要，政府还是满足了军部的要求，增拨了军费，1931年的军费“增为4.5462亿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⑧。在政治上，日本政府在国大造军国主义舆论，竭力煽动战争狂热，一批右翼法西斯团体如一夕会、樱会等纷纷出笼，竞相鼓噪，疯狂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极力鼓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在军事上，1931年6月，日本军部秘密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茨、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等人，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又“秘密招请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到东京来，命令他将上述指令传达给本庄司令官”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制造了“满洲事变”。事变发生后，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向满铁全线展开进攻。三天后，林銑十郎大将指挥下的日本朝鲜军越过国境前往支援，控制了南部满洲。这样，关东军便开始向北部满洲进攻。到1932年1月初，便占领了全部中国东北。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不仅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而且利用中东铁路问题不断制造事端，对苏联进行挑衅。1932年3月，日本又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作为它的御用工具。1932年2月，关东军为使“满洲国”臻于完整又展开了热河作战，仅10天时间，占领热河全境。5月，逼近平津地区。5月31日，日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至此，华北门户洞开。1935年6、7月间，日本又以卑鄙手段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到冀察两省大部主权。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随后又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于华北之外”。1935年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又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要把内蒙变成‘有利于(日本)对苏作战’和‘加强(日本)统治’的‘亲日满地区’”<sup>⑩</sup>，并拉拢蒙奸王公，“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田中隆吉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木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继而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军政府”。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就是妄图实现日、“满”、蒙一体化计划，以便在满蒙边境集结重兵，一方面控制中国，另一方面等待时机，进攻北方的苏联。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热、察、内蒙等地区的行动，苏联敏锐地觉察到对其远东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苏联政府认为：日本的行动不仅违反了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巴黎公约，也违反了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因为，按照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日本除在南满铁路沿线可驻少量守备兵外，不得在中国东北其它地方驻兵。但是，苏联正处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事力量发展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毕竟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因此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而希望从外交上解决两国关系问题。1931年12月，苏联建议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而，“1932年初，当日本出席‘国联’代表芳泽途经莫斯科归国时，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还主动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个建议后来又由苏联驻日大使向日方提出，由于日方态度冷淡，没有取得结果”<sup>⑪</sup>。1932年10月和1933年1月，苏联又连续两次向日本提出这一问题，结果都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显而易见，日本政府拒绝缔结和约，目的是为了准备同苏联开战。因此，1933年3月17日日本枢密院会议上顾问们提出要考虑断绝日苏邦交时，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答以陆军已有充分对苏作战的决心和准备。事实也正是如此，“到1933年底在满洲国已集结有日本军队13万左右，在他们中间每天都在加强反苏的战争宣传”<sup>⑫</sup>，随时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改变态度。1933年12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在揭露日本从中国东北对苏联进行军事威胁之后表示：“我国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开始加强自己的边防，抽调必要的部队到那里去，并采取其它军事措施”<sup>⑬</sup>。

苏联加强远东地区的防务，使得日本统治集团深为不安。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个规定虽然反映了陆军重视苏联，海军重视美国的“二元化”战略，但从根本上来看，政府对苏联的担心是急切的，因此，同日内阁又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强调把“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当前“外交政策的重点”<sup>⑭</sup>。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战略目标，除要吞下中国这块“肥肉”之外，对苏联也是虎视眈眈。正如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早在1927年呈递天皇的秘密奏折中曾不止一次地重复的那样，“迟早我们势将和苏俄作战”<sup>⑮</sup>。

然而，日军在中国东北和热、察、内蒙等地区的行动，直接侵犯了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东北人民，他们“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sup>⑯</sup>。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入侵之敌，使得“日军为镇压抗日力量而疲于奔命”，使“日军战死、病死和负伤的人数日益增大，在战争开始的1931年为2871人，第二年一跃而超过了3万人，1933年则为42149人，1934年为39874人，1935年为54766人”<sup>⑰</sup>。由此可见，穷凶极恶的日寇在东三省人民和爱国军队的打击下，每况愈下，不但“未能把抗日的群众斗争镇压下去，连‘满洲国’的治安也无法维持”<sup>⑱</sup>。

在热、察、内蒙和全国其它地区，抗日斗争也如火如荼。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中心一环——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关系从此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目标迈进，抗日的阵容将会更加扩大。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日、“满”、蒙一体化计划，打乱了它北进苏联的战略决策。因此，1937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向陆军总部上交的战略意见书中就急切而疯狂地发出了叫嚷：“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sup>⑩</sup>。东条的意见立即被近卫内阁所采纳，7月7日，悍然挑起了芦沟桥事变。

## 二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预谋陷入破产。因此，如何处理事变就成为日本统治集团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挑起事变是从对苏作战的观点考虑的。那么，如何处理事变就不能不考虑对苏作战的因素。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对事件的解决方法立即作出了反映。关东军认为，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是发动战争的大好时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并向参谋本部报告，我“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作好立即出动准备”。朝鲜军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甚至还狂言，要“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sup>⑪</sup>。在陆军中央部，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为代表的一批军人，极力主张乘机给中国一次打击，一举打开华北政策的僵局，迫使中国方面屈服，因此，要“不惜对苏备战又对华作战”！在政府、政党和其它各界中，主张强硬的“对华膺惩论”同样大有人在，铁道大臣中岛知久平和邮电大臣永井柳太郎等政党出身的大臣竟提出：趁着这个时候，把中国军队彻底打垮了算了<sup>⑫</sup>。上述情况说明，主张立即派兵到华北，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呼声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是很高的。然而，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和军部作出了与其相反的决策。

7月8日晨，外务省匆忙召开会议，确定了事件不扩大，局部解决的方针。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也确定了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向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各派出机关发出了训令。对事件扩大与否起着决定作用的日本参谋本部，也同政府保持了一致。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认为，日本正在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伪满的建设和对苏战备，兵力严重不足，一旦发生全面对华战争，会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同时，苏联有可能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使日本处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地位。因此，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筹备55亿日元军事费用的情况下，出兵中国便是失策<sup>⑬</sup>。所以，他主张对事件应该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直接向闲院宫载仁参谋总长作了说明，请示裁决。在总长的提议下，参谋本部于8日下午6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发出指令：“为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sup>⑭</sup>。直到11日晨，天皇裕仁还担心事变问题，特别是能否派兵再次提醒总长注意。<sup>⑮</sup>由此来看，从7月8日至11日，不扩大事件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并支配了政府和军部。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何在事变发生后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根据上述情况，其原因主要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在事变爆发后所担心的对苏作战问题。

关于如何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扩大方针，一般史书已有结论。但笔者认为，当时日本

中国驻屯军的总兵力只有近7000人，在远离本土、附近无重兵的情况下，要打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为了立即发动日中全面战争，那么，在事变爆发前进行调兵遣将应该说是军事常规，无须在事变爆发之后来决定处理方针和进行兵员调遣。这个方针如果用“利用局部谈判来争取时间，以等待援兵”之说来解释是难以成立的。究竟怎样看待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扩大方针的意图，蒋介石当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日军的战略目的，即在攫取平津作根据地，俾其主力置于长城一带，来对付其另一强敌苏俄；对于中国，初想运用不战而屈的政略，故唱出所谓“平津局部化”，以及所谓“地方事件”，以因袭占我东北四省侵我冀东察北的故技<sup>②</sup>。根据事变初期日本方面的有关决定来看，蒋介石这个分析不无道理。

7月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一面通过了不扩大方针，一面却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我方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和对今后提出保证。根据内阁四相会议的决定，1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向中国第二十九军当局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条件：（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芦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它各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的取缔办法<sup>③</sup>。由此可见，日本方面这些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将中国军队驱逐出永定河东岸，以达到其扼住平汉铁路咽喉，连结北宁和平绥两路，从而控制冀察与内蒙等广大地区。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扩大方针，完全是根据日军的实力和对苏作战的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其目的不外乎是利用不扩大方针作为幌子，从而强迫中国国民政府再订“城下之盟”，使其不派大军而达到完全独占华北的目的，这样，既可控制中国，又为对苏作战建立了前进基地。

### 三

日本帝国主义对芦沟桥地区的进攻，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进一步侵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救亡图存是理所当然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中国共产党的通电，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中来。在华北前线，中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团体，发动群众，组织募捐团、慰劳队、宣传队、看护队、战地服务团，广泛开展抗战活动，积极支援前线。在芦沟桥附近，铁路工人搜集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前线构筑防御工事。农民群众也踊跃出钱、出粮、出柴草；出民工，支援二十九军，一些青壮年还帮助军队修路，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质，甚至连7、8岁的小孩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刀，形成了军民共同抗日的热潮。在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大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纷

纷组织抗敌后援会，推派代表到前线慰劳，或打电报给前线的守军表示慰问。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奋勇作战，使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屡遭失败。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事变发生后，由于全国人民誓死抗战的民族意志的压力，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直接危害了它的统治，严重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因此也秘密地进行着应付战争的准备。

7月9日晨，蒋介石电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八十五师师长高桂滋、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等，率部立即向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以支援二十九军对日作战，并令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北上部队供应运输车辆。同时，还将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北平二十九军和在山东乐陵的宋哲元军长，要求他速回保定指挥，并于10日复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sup>②</sup>。当日下午，蒋又电令正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即刻飞回南京，筹划全面抗战事宜，还电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和训练总监唐生智，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于当日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纸密电，指出：“日军挑衅，齐日与吾第二十九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经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二十六路两师，第四十军及第八十五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二十五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各部队仍应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sup>③</sup>。中国政府不仅从军事上作了应战准备，同时在外交上也进行斗争。7月10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受政府之命，对日军制造芦沟桥事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sup>④</sup>，并提出如下要求：“（一）将肇事的日本军立即撤回原驻地，等待合法解决，（二）外交部对此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sup>⑤</sup>。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为芦沟桥事件正式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国策是：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中日悬案应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盼望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这些情况，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在国家存亡之际准备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中华民族的抗日御侮精神，完全出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他们迷恋着从前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并想到最近侵略满洲时，在战场上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又看到塘沽协定及其后日本对华北施加压力，中国连一点象样的抵抗也没有，就深信这次战争也会象以前那样顺利”。然而，“芦沟桥事件以后，屹立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不是皇帝和军阀，而是具有高度民族觉悟的4亿中华民族的广大群众”<sup>⑥</sup>。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不战而屈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打破了他们“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其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的军事战略<sup>⑦</sup>。

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之后，又看到中国方面正在进行抗战的动员和准备，因此不得不改变对事变的处理方针。7月10日上午，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三课认为，冀察当局及南京政府还在准备对日战争，这种状况再发展下去，不仅日本将失去出兵的时机，而且中国驻屯军将陷入优势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从速救援，应先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的兵力<sup>⑧</sup>。这一意见，连“不扩大派”也表示赞同。11日上午，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陆军大臣杉山元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迅速派往华北”。会议一致通过了杉山提出的派兵案。下午6时24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向全世界正式发

表。6时30分，参谋总长戴仁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命令，命令将关东军所辖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主力，空军六个中队、高射炮二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和电讯、汽车等部队各一部派遣去华北。7时40分，又给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同时命令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此外，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也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等等。日军上述各部队在接到参谋总长的命令后，立即向华北开进。至此，芦沟桥事变开始迅速向全面战争发展，日本陆军主力从此一步步深陷在中国战场上。由于“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在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sup>③④</sup>。因此，日本统治集团最后感到“力不从心”，“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sup>⑤</sup>。

综上所述，“日本军队开始在中国华北挑起战争时，打算用此压制中国的抗日，以发动对苏战争，但中华民族抗战坚决，日本从中国抽不回手来”<sup>⑥</sup>。由此可见，芦沟桥抗战，不仅在世界的东方开辟了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为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榜样；同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苏联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日本对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施加的军事压力，使苏军后来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有力地援助了苏联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贡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仅是为着保卫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且也是对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巨大帮助”<sup>⑦</sup>。这个评价是十分正确而公正的。

#### 注释：

- ① [西班牙]约翰森：《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第517页。
- ② [日]《宇垣一成日记》第1卷，第49页。
- ③④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6、549页。
- ⑤⑥⑦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71、872、896—897页。
- ⑧ [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
- ⑨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第117页。
- ⑩ [日]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间的哀欢》，1971年芙蓉书房版，第188—189页。
- ⑪ 洪育沂：《1931年——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3页。
- ⑫ 《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9页。
- ⑬ [苏]B·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437页。
- ⑭ 《1933年国际事务文件集》，牛津1934年版，第439页。
- ⑮ 《现代史资料》(8)，第363页。
- ⑯ 《共产国际》(1931年)，第33—34期。
- ⑰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9年版，第935页。
- ⑱ 东洋经济新闻社：《日本经济年报》，第24集。
- ⑲⑳ [日]井上清：《昭和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2—63页。
- ㉑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61年版，第333页。
- ㉒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54页。
- ㉓ [日]风见章：《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1951年版，第34页。
- ㉔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日中战争下》，朝日新闻社1963年日文版，第9页。
- ㉕ 《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2，第3页。
- ㉖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6卷，第29页—30页。
- ㉗ 李云汉：《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载台湾《中国论坛》6卷7期。
- ㉘ 《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57—160页。
- ㉙⑳ 《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第54页。
- ㉑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67页。
- ㉒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77页。
- ㉓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35页。
- ㉔ 《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60页。
- ㉕ 《日本的战争决定》，第66—67、74页。
- ㉖ 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1》，水蔦书房1973年日文版《资料解说》，第16—17页。
- ㉗ 《季米特洛夫全集》第11卷，索非亚1954年版，第80页。